

## 丸山真男的思想世界

王 前

古今中外的思想史告诉我们，影响力大的思想家不一定是深刻的思想家。但回顾二战后的日本思想界，大概除了政治立场极右的人以外，大部分人都会承认政治哲学家、思想史家丸山真男（1914～1996）不仅是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而且他也是日本最有深度的思想家之一。在丸山逝世后，日本一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曾经说，如果有诺贝尔政治学奖的话，丸山当之无愧。这样的评价虽不免有偏爱同胞之嫌，但说得也不无道理。本文拟对丸山长达60年的研究生涯做简单的梳理，对他的学术思想贡献做一个整体评价，清点一下他在思想史上究竟留下了多少值得我们吸收的东西。根据丸山一生研究的轨迹，笔者想从政治学、现代性理论及日本思想史研究等几个角度来展开论述。

### 一 丸山真男政治学的诞生

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丸山真男发表了一系列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展开批判的论文，在日本学界和论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慢慢地一个词也随之诞生了——丸山政治学。政治（哲）学上能形成学派的，似乎为数不多。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大概也就是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一个人吧。由此可见丸山在战后日

本学界的影响力之一斑了。他之所以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在笔者看来,倒不是因为他在政治学或者政治哲学方面做出了什么惊人的原创性贡献。现代的政治社会理论大多来自西方,东方的学者要在短时期里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不是不可能,但事实上却非常困难。丸山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能把学到的西方学理融会贯通起来,结合到对日本问题的分析上去,并对现实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丸山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日本早已经走上对外侵略的道路,且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作为一个年轻的自由主义者,他从内心深处厌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主义,对整个国家日益滑向错误方向持批评的态度。所以丸山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种抵抗的手段,写了好几篇关于江户时代重要思想家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等人的论文,论述他自己关于现代性的一些看法(这些论文战后结集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译本已由三联书店于2000年出版)。而丸山政治学的诞生,则还要等到二战结束。正是在日本战败以后,丸山登上了时代提供的大舞台,开始了对日本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的清算。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在此对丸山这方面的所有工作进行回顾,故下面就围绕丸山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文《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和《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来考察一下他的理论贡献。

战争结束后的翌年即1946年的5月,丸山真男在著名出版社岩波书店发行的杂志《世界》上发表了题为《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的论文之后,便从一个尚无甚名气的东京大学法学系副教授一跃成为论坛上一颗引人瞩目的新星。在众多批判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文章里为什么这篇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经典文献,至今拥有众多读者呢?在笔者看来,关键是因为丸山在该文中以独到的手法非常深刻而又准确地刻画出了天皇制国家体制的内在本质。

在深受包括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在内的

欧美思想家影响的丸山看来(丸山曾说过施密特是他一生最尊敬的“敌人”),西欧现代国家具有一大特征,就是它们都是中性国家(Ein neutraler Staat)。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家对真理和道德等价值持中立的立场,这些价值的选择和判断是交给教会等社会团体乃至个人的,国家主权的基础则置于纯粹的形式性法律机构之上。换言之,思想信仰道德等问题是属于“私事”,它的主观内部性是受到保障的,而国家权力则属于带有技术属性的法律体系。那么近代以降的日本的情况怎么样呢?根据丸山的分析,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从来没有确立过类似西欧现代国家那样的技术性的、中立性的国家主权。一直到二战结束,日本的国家主义自始至终把自己的统治根据建立在内容价值的实体之上,也就是天皇身上。在这种体制之下,作为现代性人格前提的道德之内在化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种天皇制是另一种教士和帝国合二为一的制度。国家不仅握有权力机构,而且还占有着真善美的价值体系,垄断了对这些价值观的解释权。这样一来,国家权力无法干预的个人天地是不存在的。个人性东西的存在本身向来被视为恶或类似于恶的东西,是放不上台面的。丸山的这番分析,虽然不免有把欧美的国家制度理想化之嫌(事实上现代欧美人所享有的自由及权利也是经过无数人长期而又艰苦的斗争才获得的),但我们无法否认他对从近代开始以来到二战结束为止的日本国家权力机构性质的把握是非常准确的。尽管历史上日本的天皇大多数时间里并不真正掌握权力,政治上表现为二元结构,即天皇为精神权威,幕府将军为实际统治者。但江戸幕府被打倒、明治维新开始之后,天皇的权力不再是停留于精神权威的空架子,天皇被捧为神圣不可侵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愈益成为集精神权威和国家权力于一身的统帅、整个日本统治机器的代表。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种集道德权威和国家权力于一身的统治体制的特性,丸山还对照了“盟友”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情况。丸山引用托马斯·曼的话说,德国人本质上觉得政治是一种不道德的、野

蛮的东西,而依丸山看来,这样的认识在日本是不可能有的。因为明治以后的日本国家政权既然集道德权威和权力于一身,于是权力始终可以披上一层伦理的外衣,赤裸裸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宣言是做不来的,伦理掩盖了政治所具有的恶魔般的性质。所以从外在表现来说,日本的政治家既没有那种西方式的内在谦卑,也没有赤裸裸的权力性。在这个意义上,丸山认为东条英机是日本政治人物的典型象征。

那么在这样的国家体制中,一切价值的判断是怎么做出的呢?丸山认为还是离不开天皇。也就是说,价值标准的测定,是依据跟天皇之间的距离来的。在权力的金字塔中,不用说天皇是位居顶端,所有子民的地位价值全部取决于他们跟天皇的远近。你离天皇越近则越具有权力。所以个体的独立性在这种环境中难以存在。正因为如此,在日本的政治体系中,很难有独裁的观念(不是说没有独裁,而是没有那种很强的独裁的观念)。因为真正的独裁观念,是以自由的主体意识为前提的,而近代日本一直到二战结束都缺乏这样一种意识。虽然也有过个别特立独行之士,也有过最高学府的教授们集体抗议文部省对教育横加干涉等令人钦佩的运动,但就总体而言,自由的主体意识始终难以在近代日本扎根。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天皇制的存在。那么,作为天皇本人来讲,他既然是权力的中心实体,同时还是道德的源泉,照理说他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实体了吧。事实却不然。为了说明天皇制的特征,丸山还是援引西欧的例子,两相进行对照。在他看来,近代早期的欧洲专制君主,他们从秩序的维护者变为秩序的创造者之后,成为历史上最早的自由人格。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当时的口号是回归到神武天皇创业的远古,是对皇祖皇宗的复归。天皇继承万世一系的皇统,根据皇祖皇宗的遗训来统治。所以天皇本身的权威也不是建立在他个人身上的,而是依靠皇统(法统)支撑起来的。只有在皇统之中,他才具有权威,他才是绝对的存在。丸山打了个生动的比方说,天皇和他的臣民的关系好比是同心

圆,天皇位于同心圆正中,万民环侍。而天皇所在的那个点,又不仅仅是个点,其实这个点位于穿过它的一根纵轴上。这根纵轴就是代表皇统,代表天壤无穷的皇运。这样的皇运要无穷,当然是困难的。二战的结束使日本的国体丧失了绝对性,从而为日本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个人——自由的主体——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包括丸山在内的进步知识分子都这样看待历史的巨变。

如果说“超国家主义的逻辑和心理”是揭开了丸山对他所深恶痛绝的军国主义体制批判的序幕,那么三年后发表的《军国统治者的精神形态》则进一步细致而精准地刻画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分子的精神世界。在这篇论文中,丸山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他把大日本帝国的整个统治体系称为“无责任的体系”。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包括前首相等军政要员在内的日本战犯的过程中,有一个现象令众审判官大为惊讶,就是那些战犯们都异口同声地否定自己的战争责任。这和纽伦堡法庭上的纳粹战犯形成鲜明对比。为什么两个帝国“盟友”之间会有如此天壤之别?也许是出于人之常情,为了逃避法庭的追究。但是在丸山看来,其中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矮小性”。在行文中,他多次引用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通过审判员和曾经位居高位的战犯们的对话来挖掘出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们的精神特征。丸山指出,通过审判可以看出那些战犯身上主体责任意识极其缺乏,具体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既成事实的屈服,另一个则是以权限作为借口(即在被追究责任的时候老是声称不在自己的权限之内)。这些固然有其制度上的原因,其根子可以追溯到明治时代。当时多种政治力量存在于日本政坛上,依靠明治天皇的权威使各种力量得以统合起来。而一旦失去了强有力的领导人之后,权力系统内部的各种倾轧和争执便成了日常生态。尽管在战争时期昭和天皇仍旧是最高统帅,但他毕竟不具备祖父明治天皇那种绝对权威。因此军部、重臣及其他各种势力之间缺乏真正的现代

国家所应有的内在有机联系,导致权力机构低效率运行,进而塑造出一大批“无法承担责任”的领袖人物。通过丸山的叙述,我们可以发现,即使在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德国纳粹盟友有别。

丸山在对那些战犯的精神世界进行无情解剖的时候,他也没有忘记西方的参照系(批评丸山的人常常喜欢给他一个封号:西方中心主义论者。关于这点笔者在后面还会谈及)。通过德国战犯和日本战犯的比较,他想强调的还是一片:日本社会的精英,整个社会的领导层都缺乏强烈的主体意识,整个社会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系统。丸山这样分析,当然绝对不是要为东条英机等人开脱罪名。恰恰相反,他想通过对具体审判案例的细致分析,揭示那些人的病态的精神世界,搞清病理之所在,为战后日本社会的改造提供一种客观分析。至今还有论者会引用丸山在该论文中所使用的术语“无责任的体系”来分析当代日本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由此可见作为一个政治学家,丸山把握现实、分析现实的惊人本领。

## 二 丸山真男的民主主义与“在家佛教”

在观察丸山真男在政治学方面的工作时,除了在战后初期的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清算的一系列论文外,我们还需要注意他在另一个活跃阶段——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简称安保斗争)时期的贡献。所谓“安保斗争”,指的是发生在1959年至1960年的日本人民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运动。运动的起因是由于岸信介内阁不顾广大国民的反对强行通过条约的修正案。许多不愿再被卷入战争的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一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丸山真男也和许多著名知识分子一起走出书斋,参加群众的示威游行,并在理论上做出支援。尽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最后并没有能够阻止修正案的通过,但还是导致了岸信介内阁的倒台,可以说是日本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一个高潮。下面笔

者就简单地考察一下这一时期丸山真男在政治理论上的一些独特见解。

丸山真男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在构建自己的政治思想的过程中,英美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他的影响很大。战后他曾经著文介绍过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揭示在建设民主的日本的过程中洛克的思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丸山战后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日本奠定坚实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使之真正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从制度上来说,日本在明治时代就开设了国会,至少表面上来说具备了君主立宪制的框架。但这种“疑似”君主立宪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暴露出许多缺陷,逐渐走向崩溃。战后在美国人主导下制定了新宪法,就是宣布永久放弃战争的著名的和平宪法。由于麦克阿瑟将军领导的占领军当局所推动的一系列民主化措施,日本的政治体制基本上采纳了英美那样的民主体制。但这毕竟是从外部引进的体制,要使这样的体制及其背后所包含的思想真正为日本人所接受,并不是短时期里就可以做得到的。这个课题一直占据着作为政治(哲)学家的丸山真男的思考。面对时代的课题,丸山虽然没有能够提供一整套原理性的政治(哲)学理论(外来的政治框架本身正是丸山所拥护的),但是他的一些关于如何培养民主主义,如何巩固民主主义的见解,还是颇有特色、对今天的世界也许不无启示。

在丸山的代表作里有一篇叫做《‘是’什么与‘做’什么》的文章,已经成为现代日本思想史上的一篇小经典了。简单地举个例子来说,这个题目分别代表两种态度。比如一个人说“我是自由的”,另外一个人说“我要为自己成为一个自由人而努力”。前者可以说是一种静态的生存方式,后者是一种动态的生存方式。从整个文章的脉络来看,显然丸山肯定的是后一种方式。因为在他看来,前者如果不用具体的行动去捍卫自己的自由,早晚会丧失自由;而后者因为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在确认、在努力捍卫自己的自由,所以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丸山这样的二分法,不无简单化之

嫌,如同很多归类划分一样。但是细察一下丸山的用心之所在,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他其实是要否定那种思维的僵化模式,为了反对拘泥于理论,无视现实状况变化的唯名论者。在他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是代表了前现代和现代的本质性区别。如果说在前现代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是身份的话(“是”什么决定你有什么、可以做什么),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不管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的权威,都要问一问它们的现实功能和用处,让它们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才是现代精神的特征。丸山把莎翁代表作“哈姆雷特”中有名的台词“to be or not to be”改成“to do or not to do”,用这句话来概括现代社会中的人最关心的事情。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精神则体现在儒教的三纲五常里面。你是什么就该做什么,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地位和身份。丸山虽非创立了高度抽象的理论体系的大家,但他极其擅长使用理念型手法去分析解剖问题,获得画龙点睛的效果。这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丸山之所以要使用这样的二分法,如前所述,是有其政治上的针对性的,是充分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状况而开出的药方。和同时代的柏林、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不同的是,丸山面对的是一个民主主义历史很短,自由主义还谈不上已经扎根的国家。他既要去宣传现代民主主义的原理,进行政治上的启蒙,同时他还要去关注如何使得刚刚成形的民主制度不至于失去它的内涵,变成徒有形式的东西。为此,丸山主张进行最广泛程度上的议论,即使对议会政治制度本身都可以批判讨论,否则议会政治本身岂不是跟战前的天皇制一样,蜕变成一种新的国体了吗?丸山指出,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自古以来靠图腾来维持秩序的、所有部落社会的共有的本质特征。

从巩固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丸山还批评了部分日本政治家的一些很“专业”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家的事情,普通的老百姓不应该管。如果文人学者去关心参与政治,乃是典型的越位和不务正业。针对这种似乎非常专业的看法,丸山认为



这其实是对现代民主主义的曲解。现代民主主义本来就是把政治从具有特定身份的一小部分人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将其扩大到广大市民中去的运动。而支撑着民主主义的大部分市民从事的是政治以外的职业。没有不同身份的市民的政治参与,根本就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丸山认为要使民主主义在日本扎根,就必须有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们的广泛参与,这才是最根本的保证。否则不知不觉哪一天醒来之后,民主和自由也许只是徒有虚表,一切都又要退回到战前的专制状态。

为了进一步阐发上述观点,丸山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在家佛教”式民主主义的概念。日本思想传统中的所谓“在家佛教”的观念,顾名思义,指的是不用出家就可以皈依佛教。丸山把这个概念来了个脱胎换骨,赋予新的含义。具体地说就是指非职业政治家的政治活动。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丸山非常看重普通人对政治的参与,因为他觉得这对民主政治来说是个死活问题。为了使民主主义不失去其生命力,唯有让广大人民积极参与其中,对代表他们权利的政治家及其政治活动进行监督。

在总结“安保斗争”经验教训的时候,丸山高度评价了该斗争的历史意义,认为通过这次斗争使得原本由上而下制定的宪法获得了真正的生命,宪法所体现的精神变成了日本人民的血肉,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虽然没有能够组织法律的通过,但极大地强化了主权在民的意识。通过参加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加深了丸山的一个信念:那就是民主主义没有完成的时候,需要民众永远地呵护和努力,方能使之不断完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作为永久革命对象的民主主义的概念。

综上所述,丸山真男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不仅具有很强的历史感,而且他的现实感也是出类拔萃的。这点和丸山很推崇的英国政治哲学家伯林非常相似。尽管他和伯林一样也没有能够建立政治学方面的体系,但他推陈出新,提出了诸如“在家佛教”式民主主义之类的观点,为解决现代民主面临的问题,提供了很有价值

的一种思路。当然,后来日本社会的发展证明他对民主发展的看法也并非全部正确。比如,他展望日本民主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曾经对工会的作用寄予厚望,希望日本的工会能够承担起发展民主的重任。但结果和他的预料的有很大的差距。究竟如何完善现代日本的民主主义,这是丸山没有能够最后解决的课题,答案只有靠后来者来思考了。

### 三 “西方中心主义者”眼里的现代性

丸山真男的研究领域是日本政治思想史,但起先是想研究西方政治思想的,对日本的传统的那一套并不怎么有兴趣。他在学生时代师从日本著名的政治哲学家南原繁(1889~1974)。南原繁也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是研究费希特哲学的权威,二战结束后不久担任过东京大学校长。丸山在他那里受到了良好的西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和政治学——的训练,打下了极其扎实的基础。为什么丸山的处女作研究的却是他原先极其反感的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思想呢?这和南原繁有关。由于当时日本日益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一些御用学者文人提倡日本故有的思想,搬出日本国学等来做精神武器。南原繁认为,为了反击那些乱七八糟的学说,有必要对传统的日本思想进行科学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丸山对江户时代的儒学、国学花了很大的功夫进行研究,写出日后成了经典之作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这是他20多岁时候的作品,从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不少观点未免显得有点儿牵强附会,他的研究动机似乎影响了他在学理上的判断<sup>①</sup>。书中存在的

<sup>①</sup> 在1952年写的《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后记中,丸山真男提到了自己当时写作论文时的思想环境。在震耳欲聋的超越现代、否定现代的口号声中,他想通过对明治维新中的现代性乃至江户时代现代性要素的成熟过程的研究,表达自己对政治形势的反抗,拯救自己的灵魂。参看《丸山真男集》(日本岩波书店,1996年)第五卷,第290页。

问题已经由许多日本思想史专家指出过,笔者在此无意赘述。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阅读此书后,不得不佩服一个才20多岁、初出茅庐的学者的学术功底和眼光。贯穿此书的问题意识,简单地说就是现代性的问题。丸山在此书中主要通过对江户时代的两个思想大家获生徂徕和本居宣长的研究,来回答日本江户时代是否存在现代性的问题。根据他研究的结果,获生徂徕和本居宣长的思想在不同层面上具有现代性,这些是日本现代化的思想资源(似乎中国也有类似的学术研究)。对这样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不过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从丸山的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贯穿他整个学术生涯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主线——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在题为《现代性思维》(作于战争刚结束不久的1946年)的文章里,丸山说他在学术上最关心的是要弄清楚日本的现代性思维的成熟过程。战争中,曾经有一些日本著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超越现代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西方的那些价值观早就应该被超越被克服了。可是历史总喜欢跟人开玩笑,令那些战争中颇有为全世界人民开辟新道路新方向的勇气的日本思想家们尴尬的是,战争一结束,回过头来又要重新开始学习照理是早就被超越了的民主主义等“旧”货色。在深受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丸山真男看来,真正的现代性在日本从未曾扎下根过。“现代性思维”其实可以说一篇思想宣言,是理解此后丸山学术生涯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献。从这篇短短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丸山既反对超越现代性一派的学说,也反对否认日本跟现代性无缘的看法。换言之,他并不同意现代思想等同于西欧思想。他发誓要像通过对3加2等于5这样的判断的批判来开始哲学思考的康德和通过对一个商品的分析来建立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的马克思那样,执著地去探究日本的现代性人格的确立。从丸山日后发表的著作来看,他正是沿着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的。可以说丸山本人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祖国所耳闻目睹的一切及日本的战败,构成他的学术研究

的重要背景。在此,笔者想就稍稍梳理一下丸山关于现代性的学说。作为政治学家,丸山不可能像文化史家、历史学家那样去考察现代性。对他来说,现代性人格的建立,肯定是和政治分不开的。所以在他的关于现代性的思考里,很自然的要包括关于政治(哲学)方面的见解。这一部分的丸山真男的观点,在上面已经进行了评述,这里就不再涉及。在此打算从其他角度来评价一下丸山的“现代观”。

究竟什么是现代性?为什么要追求现代性?这些问题也许是没有统一答案的。思想家们的看法也不一致,众说纷纭。既有坚持启蒙路线,宣称要继续追求现代性的思想家(像哈贝马斯),也有认为“现代”已经过时,时代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观点(比如后现代主义者)。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丸山真男是属于前者。他认为日本的现代性问题集中体现为融“后现代”和“前现代”于一身(丸山的原文是“超现代”和“前近代”)<sup>①</sup>。在经济上,日本不管战前战后都是有出色的表现。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冲击的国家中,第一个自主地做出反应并成功地实现国家转型的正是日本。这的确是日本了不起的地方。但日本是不是真正地成为一个现代化了的国家了呢?在物质上,没有人能够否定。但在精神领域它是不是也完成了现代化了呢?在包括丸山在内的一批具有宽广视野的知识分子看来,答案是否定的。精神思想领域的现代化,正是作为思想家的丸山真男终身探索的课题。根据丸山的理解,精神领域的现代化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使每一个日本国民成为真正自由的主体,建立真正的主体性。通观丸山的著作,可以说主体性是丸山所理解的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日本近代的启蒙思想大师福泽谕吉(1834~1901)是丸山真男最崇敬的日本思想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对福泽景仰不已,晚年他还和几个年轻人一起组织读书会,专门研读福泽的代表作《文明

<sup>①</sup> 《丸山真男集》第七卷,“日本的思想”第194页。

论概论》，并发表了洋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可见其对福泽投入之深。关于福泽谕吉的研究，是丸山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丸山借对福泽的研究，阐发了不少自己的关于现代性的观点。福泽谕吉在近代日本的变革时期，通过自己的著作反复强调“独立自主”、“独立的气象”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丸山真男是接着福泽谕吉在讲。在丸山的著作里经常出现主体性、自主的、主体的决断等词语，有时还要在主体前面加上诸如“强韧的”这样的修饰（见论福泽的《福泽谕吉的哲学》一文，《丸山真男集》第三卷），来突出个人主体性的重要。在论述现代精神的特征的时候，丸山反复说明主体性操作在对自然的认识过程中和对人自己所建立的制度的运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视之为典型的现代特征。

在具体论述人的精神的主体能动性的时候，丸山很喜欢引用福泽谕吉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感溺。这个《世说新语》的篇名颇受福泽的青睐，在著作中频繁使用，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中。从福泽所使用的文脉来看，他所说的“感溺”指的是人们墨守陈规，不顾现实的变化而拘泥于原有的价值标准。福泽在手段自我目的化倾向中看到了无数的“感溺”现象。比如武士佩刀，原先是为了护身的，可是到后来却变成了一种摆设，等等。在政治领域中也有类似现象。比如专制主义把所有社会价值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进而导致人们的思考判断模式的僵化。可以说判断上的绝对主义跟政治上的绝对主义是孪生兄弟。福泽当然是反对各种各样的“感溺”的，他主张建设一种充满活力的社会，让不同意见得以竞争，使政治权力无法独占价值系统，承认价值的多元性。为此他还创造了一个词：多事争论。丸山在考察福泽所使用的这个概念时指出，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里，由于主体面临的环境时时刻刻在发生变化，所以主体要有精神上的准备，要能动地去做出反应。而人的判断力在不断的活动和紧张状态中会愈发进步，人的精神从而能够摆脱“感溺”。福泽与

众多启蒙主义思想家一样,认为人的进步就是自由意识的进步。丸山也继承了这个观点。

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这两位思想家不用说是真正做到了独立自主,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自由的主体了,但是他们竭力去启蒙的大众呢?当然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日本相比,他们的目标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但如果和欧美很早就进行现代化的那些国家相比,结论就有点微妙了。不久以前,一位以研究和翻译黑格尔哲学而出名的日本哲学家长谷川宏写了一本名为《如何读丸山真男》的小册子(日本讲谈社,2001年)。他在书中评价了福泽谕吉和丸山真男为在日本塑造自由的人格(主体)所做的努力。在他看来,福泽和丸山所反对的那种阻碍自由主体发展的权力偏重的现象至今还存在于日本社会,颇有势力(比如政府部门对民间企业的强大影响力等等),现代西方的社会思想并没有真正在日本扎下根。换言之,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二战结束也已经有半个世纪了,福泽和丸山这两位思想家努力的成果并不十分理想。据长谷川宏分析,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关键在于那些西方的社会思想,什么主体性啦个人自由啦,等等,它们都是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诞生的理念,而对日本来说都是舶来品。如果社会发展过程不同的日本的民众没有真正感到那种强烈的内在需求,又如何使其真正有效地移植呢?长谷川宏的看法对所有想输入外来学理到本土的人们来说,似乎都有启迪。丸山本人当然是坚决主张移植先进的科学的观念的。他曾经以欧洲成功地引进诞生于中东的基督教为例,证明思想观念引进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在肯定必须引进一切有用的学说的同时,他也承认精神革命的迟缓性等问题。也许长谷川宏对丸山的批评触击到了他的理论操作的一个“软肋”:如何才能真正地把一套先进的理论和国情、民心结合起来,从而有效地实现价值观念的输入。否则,再高尚、再动听的理论,也会被泡沫化。

#### 四 另类的温故知新——“原型—古层”学说

在1968年全世界都暴发了学生运动,日本也不例外。在这场学生运动中,丸山真男身心都受到冲击。此后,他很少再介入时事。表面上看去,似乎做起了粹然书斋学者来了。他更加集中精力研究日本政治思想史,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原型—古层”学说,发表了著名的《历史意识的古层》等晚期代表作。丸山的这些研究曾经引起过误解。有人说丸山似乎犯了他自己也批评过的一些日本思想家犯过的老毛病,年轻时推崇西学,一到晚年却又礼赞起本土思想来了。那么,丸山的本意究竟如何呢?他为什么要费那么大的工夫去钻故纸堆,寻找什么思想史上的原型和古层呢?

以前李泽厚在论述中国传统思想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心理积淀”的概念。丸山所说的原型(后来改名为古层,也说通奏低音[obstinate bass])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想找出思想背后的一些规律性东西。通观日本思想史,几乎所有的或多或少成体系的思想都是外来的。从古代输入的中国思想,到近代日本开国以来大力吸收的西方思想,可以说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思想产品日本都有库存。但它们进入到日本后,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整容”,有的还经过大幅度的“修理”。那么,究竟日本的思想界是如何对外来思想进行改造的呢?是否存在一个改造的原型?这就是丸山所关心的问题。丸山经过多年的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发现一种对外来思想进行修正的“修正主义”模式总是反反复复地出现。最早是在1963年讲课的时候他提出了原型的概念,在1972年发表的“历史意识的古层”中具体地阐述了相关见解。丸山通过对日本的“记纪神话”(即日本古典《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的研究,想到了原型这个概念。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丸山采用的是消除法。因为原型本身并不是一种学说,要通过消除法使之凸显出来。日

本神话成形大概在公元六七世纪。此时日本已经受到中国文化的强有力的影响,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渗透,绝不弱于明治维新时期的西方文化。所以日本神话本身并不是丸山所想找的原型。依照丸山真男的消除法,先把日本神话里所有跟中国思想相关的观念都拿掉,然后再排除佛教方面的理念。这样结果还是会剩下点什么,不会一无所有。而这个剩下的 something 就构成原型的片段。原型不是教义,要形成教义则必须借助于外来的世界观。就像日本固有的宗教神道一样,如果不借助其他思想的话,根本无法构筑自己的体系。在丸山的眼里,通过消除法凸显出来的原型——哪怕是片断式的思想——令人惊讶地反复出现在日本思想的发展史中,不断地修正外来思想,使其日本化。由于原型容易给人以宿命论的感觉,丸山后来改用古层这个词。古层的话,也许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还能彻底地摧毁它,重新建立新的思想,可以给人以希望。不过不管原型也好,古层也好,通奏低音也好,它们本质上都只是一种比喻而已。丸山并不是想说在日本思想中既有变化的要素,也有永恒的部分。他想追问的是在变化中所采用的那种变法、在那种变化模式里反复出现的那个“音型”。换一种说法,丸山他想说日本思想正是由于有某种思考、思维的模式,所以它能够不停地变幻。如果从正统对异端的角度来看,丸山不是想说尽管有正统思想的统治,不时还会出现异端的思想,而是想说日本的思想由于其本身不具备成为正统的条件,所以会不断出现嗜好“异端”的倾向。

在详细论述古层学说的时候,丸山从“历史意识”、“伦理意识”和“政治意识”三个角度展开。笔者对日本的古代神话了解不深,很难在此对古层学说的内容及其真理性进行严格的考察。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理解丸山做此研究的一片苦心的。他并不是要去复古,为日本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从日本传统文化方面找出思想资源进行理论上的论证、大唱赞歌。恰恰相反,他的这番考证和研究,跟他一贯的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跟庆应义塾



大学(创办人为福泽谕吉)的学生一起讨论古层问题的时候,丸山说自己受黑格尔的影响,觉得在思考“我是谁?”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把自己对象化来进行认识,就可以把自己内部无意识的那部分提升到意识的层次,不至于将来什么时候无意识的东西突然冒出来使自己深受其害,至少可以减少那样的灾难<sup>①</sup>。当然他想说的是对日本的认识。他要通过自己的研究加深人们对日本思想的认知和理解,获得整体上的把握,从而有效地克服其弱点。他是把对过去的正确认识作为变革的第一步来看待的。丸山之所以要进行这种深层次的学术思考,和他战前借古讽今,通过研究江户时代的思想来谈现代性的作法,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在同一个讨论会上,丸山还对日本人在经历了那么一场大灾难之后,竟然那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感慨万分。由此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一个伟大思想家进行思索的深层动机。当然,丸山的“原型—古层”说,也容易在极端的意义上带来某种危险性,即倘若对该学说作出超学术的铺张,便容易引出曾经给日本国民带来过灾难的“日本主义”。这一点,已开始被国内外一些学者所关注<sup>②</sup>。

当代日本另一位博学多才的著名思想家、作家,也是丸山真男挚友的加藤周一(1919~ )曾经这样总结过明治时代以来的日本知识分子对欧洲文化的态度:第一阶段(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欧洲文化的某个部分;第二阶段(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整个欧洲的历史和文化;第三阶段(二战之后)又重新注重欧洲文化的某一部分<sup>③</sup>。依据这个分类来看,丸山进行学术活动的时期横跨第二和第三阶段,我们可以说他既关注整个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又同时对某个部分(政治哲学)进行了精深的

① 参看《丸山真男集》第十一卷,第222页。

② 参见黑住真:《日本思想及其研究——有关中国认识》,《中国——社会和文化》第11号,1996年6月。又,韩东育:《丸山真男的“原型论”与“日本主义”》,《读书》2002年第10期。

③ 《林达夫著作集》第一卷解说,平凡社,1971年。

研究。用丸山经常引用的小穆勒的话来说,他是一个既对某一样东西非常了解,又对所有的东西略有所知的人。

在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势文化面前,丸山没有随波逐流,紧跟西方思潮的起落。也没有以本土文化为本位的态度拒斥外来文化。他继承了福泽谕吉的那种态度,承认西方文化暂时的优势(所以终其一生没有停止对西学的吸收),但又绝对不把西方思想文化绝对化。这样就给本土的思想资源留下了发展的余地。治学上他融会贯通了和(日本)、汉(中国)、洋(西方)三大块思想资源。在这三大块之间日常进行着思想上的往复运动,没有僵化的界限划分,真正做到了打通。中国思想界从近代以来,面对西潮,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不同时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态度。日本也有类似的问题。“和魂洋才”大概可以说就是中体西用吧。从这种用词上也可以看出中日两国近代以来的共同困惑。到了丸山真男这一代,尽管上距明治维新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但还是不时出现像上面提到的超越现代等思潮。丸山能够始终在文化的撞击中采取开放的姿态,广泛吸收东西学理,把它们变为自家宝藏。从理论的原创性的角度来看,也许丸山算不上是第一流的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大家,如果参照他的同时代的那些西方思想大家的话。这其中有些思想家本身的好恶问题,更多的也许是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占据绝对优势的大气候所决定的,我们难以苛求丸山。现代社会的许多根本性原理毕竟大多不是东方思想家发明或者发现的,这是丸山和我们共同面对的境况。

纵观丸山一生思想脉络的发展,可以说他是个典型的继承了近代西方启蒙主义真精神的思想家。在据说已经进入了后现代的今天,他的关于现代性的很多想法,在对现代性抱着强烈批判态度的人们看来,大概显得非常落伍,跟不上时代要求了。对这样的批判,丸山在20世纪60年代就做过答复。对西方思想的发展始终抱着极高兴趣的丸山跟许多西方大师级思想家都有过交流,比如萨特、列维·斯特劳斯、福柯等等。他了解新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

(据他自己说,还在书信中跟列维·斯特劳斯讨论过现代性的问题,两人的观点并不一致)。不过在他看来,日本有日本的情况,不能盲目地跟着西方理论走。这个立场也是他在《现代性思维》一文中所表明立场。西方人说解构就跟着解构,趋时追新,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肤浅的行为而已。一直到他去世为止,丸山固执地坚持了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立场,可以说现代性的问题是纠缠了丸山真男一生的大问题。笔者对后现代理论了解不多,不敢妄下雌黄。但是如果围绕那些历史事实来思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丸山的目的是要解决日本社会所存在的问题。那些究竟是不是问题,究竟要不要改革,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左派有左派的说法,右翼有右翼的见解(对昔日的大日本帝国颇怀旧的日本右翼政客甚至说丸山是把日本搞到今天这种糟糕地步的恶魔般的知识分子之一。加藤周一也赫然被列名其中)。站在右翼的立场来看的话,丸山要否定的东西正是他们想竭力支持和维护的。至于丸山是不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者,很久以前就有人问过。如果不顾矛盾律来下个结论的话,可以说是也不是。说是,那是因为丸山的确是拿西方做参照系来展开对日本的分析 and 判断的。他的关于启蒙的观念,跟康德以来的西方启蒙思潮一脉相承,在这点上丸山和哈贝马斯完全可以对话,找到很多共同语言。说他代表了启蒙主义的真精神,是因为他的一生劳作都反映了康德对启蒙的定义:“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sup>①</sup>。”说他不是西方中心论者,是因为他并不认为现代化

---

<sup>①</sup>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何兆武译的康德有关历史、政治哲学的论文集《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等同于西方化,和福泽谕吉一样,没有把西方文化作为一个终极的参照系统。

通读一下丸山真男的所有著作后,我们可以说他留下的作品是一个处于东西方文化撞击中的日本思想家对现代性思考的结晶。和任何一个思想家一样,他的判断和开出的药方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但只要有人还被现代性的问题所困扰,还有要朝现代化方向发展的社会,那么他的著作就肯定还没有过时。尤其对一百多年来一直在西潮的影响之下思考现代中国及其文化发展方向的人们来说,毫无疑问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